

外国文学函授教材

第 五 期

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

北 京 • 1985

外国文学函授教材·第五期目录

1. 外国文学史

第五编 近代亚非文学

前言	张 弛 (1)
第一章 近代日本文学	高慧勤 (2)
第二章 近代朝鲜文学	周有光 (13)
第三章 近代印度尼西亚文学	张志荣 (19)
第四章 近代越南文学	李修章 (21)
第五章 近代泰国文学	栾文华 (24)
第六章 近代印度文学	周志宽 (29)
第七章 近代伊朗文学	元文琪 (35)
第八章 近代阿拉伯文学	鄧溥浩 (40)

2. 比较文学

第三章 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三) 平行研究的内涵	刘象愚 (46)
-------------	------------

3. 外国文学思潮和流派

魔幻现实主义	林 安 (52)
--------	------------

4. 外国文论选讲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思想	程正民 (58)
-------------	------------

5. 外国文学翻译辅导

漫谈翻译问题	戈宝权 (64)
--------	------------

6. 外国美术知识

第五章 古代罗马美术	李 春 (67)
------------	------------

7. 外国戏剧知识

意大利当代戏剧	〔意大利〕罗·马祖科 (73)
---------	-------------------

通知	(72)
----	--------

主办：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第五编 近代亚非文学

张 弛

前 言

亚非各国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近代时期的起迄点也不尽相同。日本由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朝鲜由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印度尼西亚以荷兰的殖民统治为近代时期,由十七世纪绵延至二十世纪中叶;越南以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为起点,直到1945年从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即由1858年至1945年;阿拉伯国家近代史的开端则以十九世纪初叶阿拉伯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为标志;……尽管互有差异,但总的说来,亚非地区的近代时期要比欧洲短暂得多。因此,近代亚非文学的时间跨度也比近代欧洲文学小得多。

不过,亚非地区相对短暂的近代历史,却充满了剧烈的社会变动以及国内国际的矛盾和斗争。这时期的亚非文学也有着异常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可贵的艺术价值。

冲击封建制度和保守思想的羁绊,革新思想空前高涨,是亚非许多国家进入近代历史氛围的一个鲜明的征兆。十九世纪初叶,阿拉伯国家的思想文化复兴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便是突出的表现。而与这新思潮伴随而生的,则是启蒙文学。日本明治初期“明六社”的活动便属此例。朝鲜的启蒙文学尤有成就,它不但创立了迥别于旧小说的“新小说”,产生出反映新旧思想对立和斗争的《雄岳山》等新小说佳作,发展了鼓舞民族精神的“英雄传记”体裁的写作,而且促

进了外国进步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

近代亚非各国一个共同的经历是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和长期蹂躏。反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这些国家人民在这个历史阶段面临的根本使命,构成了这时期社会生活的重大内容。作为这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文学在这些年代里显得十分活跃。反殖民主义的文学在战斗中发展和壮大,硕果累累。印度尼西亚诗人威廉·伊斯坎达、越南作家潘佩珠,都曾奋力投身反殖民主义斗争,并创作出直接服务于这一斗争的有名的诗篇。在对待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上,也有投降派与抗敌派的分歧。但普遍的规律是抗敌的进步文学总是日趋强大,并最终由爱国主义进化至社会革命的立场。越南抗战文学的历史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随着时代的发展,东西方之间和东方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比前一历史时期频繁得多。《柯苏特传》、《彼得大帝传》以及圣女贞德的传记在朝鲜的翻译促进了朝鲜本民族的英雄传记的创作;在欧洲文学的影响之下,浪漫派、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等文学流派在日本的相继出现是又一个证明;中国的《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在泰国的翻译介绍更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不过,与此同时,亚非各国也都在寻求本民族文学更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形式。朝鲜的新小说,越南以拉丁文文学代替喃字文学的努力,便是有意义的尝试。

第一章 近代日本文学

高慧勤

第一节 概述

日本的近代文学，发轫于明治维新（1868）时期。从史的角度来看，日本的近代文学比西方晚了一百多年。那时，西欧各国早已经历了启蒙时期，浪漫派文学，进而从批判现实主义转向自然主义，而象征主义同时又在兴起。这时，日本近代文学，却刚刚从前近代的江户文学^①中脱颖而出，开始起步。然而，“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自有奋发图强、急起直追的进取精神，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论是在自然科学抑或是社会科学方面。文学方面当然也不例外。近代文学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经过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借鉴西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实现了一次飞跃，走完了西方近代文学二百多年的路程，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鸥外、岛崎藤村、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等，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新的时代，产生新的文学。日本近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另方面则是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基本动力虽然是反封建、反殖民压迫，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建设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广大日本人民，但是领导运动的，是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所以这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保存下来许多封建因素，只建立了一个君主独裁的天皇制专制政权。这种客观形势，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明治维新后，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建锁国政策，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西方的先

进思想和科学文化得到广泛介绍，一时之间犹如潮涌。明治维新后的头一二十年，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启蒙时代：是打破封建思想、铲除封建束缚的时代；也是自我觉醒、尊重个性、争取自由的时代。为了除旧布新，首先便是一切取法西方。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启蒙思想家，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代表明治初年新知识阶层的思想要求，也是适应当时自由民权运动的需要。

明治六年（1873），福泽谕吉等人成立明六社，发行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介绍西方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科学，宣传启蒙思想，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给同时代人以很大影响。福泽谕吉的《西洋情况》（1866—1870）、《劝学篇》（1871）、《文明论概略》（1875）等著作风靡一时，成为当时非常普及的启蒙读物。此外，西周的《百学连环》，可说是日本最早的百科全书。中村正直所译英国作家斯迈尔斯的《自助》一书，题名《西方国家立志篇》，影响也颇大。这些启蒙读物所起的社会作用，不仅在于否定江户时期旧文学的影响，还在于传播新知识，启蒙民智，而其表达的新颖，论述的平易，也一扫儒家说教的陈规旧习。近代文学正是在启蒙运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才逐渐形成的。

文明开化的宗旨，既然在于效法外国，学习西方，那么翻译介绍西方的科学著作、文艺作品当然是应有之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翻译和改编西方文学为主。从薄伽丘、莎士比亚、司各特，到雨果、大仲马、凡尔纳、爱伦坡和屠格涅夫，那时简直可以说是翻译的时代。译介的作品，以科学幻想

^① 江户时代（1600—1867）的文学。

小说和政治题材作品为多，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凡尔纳的《周游世界八十天》、《月界旅行》、《海底两万里》等科幻小说，司各特的《兰马莫阿的新嫁娘》、《湖上美人》，雨果的《九三年》，大仲马的《攻克巴士底狱》，以及《天方夜谭》等。这些早期翻译小说，尚处于草创阶段，难免失之粗糙，译笔生硬，只是“文明开化”的一个产物，目的在于展示西方的风俗人情，改良日本本国的传统文学，显然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由于这些小说在内容上具有适度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社会意义，辅之以才子佳人大团圆的言情故事，所以受到当时不满江户时期戏作文学的知识分子的欢迎。尤其英国的政治家兼小说家李敦和迪斯雷利，法国的雨果和大仲马，他们的那些具有政治内容和社会视野的作品被相继翻译过来，对当时政治小说的创作并无影响。

日本的政治小说，盛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翻译小说相比，具有很强的现实内容，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提出了设立国会、成立政党的民主要求，代表作品有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1884）、东海散士的《佳人的奇遇》（1885）、末广铁肠的《雪中梅》（1886）和《花间莺》（1887）等。这些作者大抵是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家，借小说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同时也与翻译小说相类似，穿插进波澜起伏的爱情故事。所欠缺的，是这一时期还没产生独具面目、卓有民族风格、反映新的时代精神的作品。但不论翻译小说译笔如何稚拙，政治小说艺术如何粗糙，毕竟是新文学的先声，起到启蒙的客观作用。在介绍新思潮、新作品的同时，文学的价值也开始为人们所认识。西方文学中的反封建内容和民主思想，多样的题材和新颖的技巧，也促使新文艺得以迅速摆脱旧文学的羁绊。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日本社会和文化

的一个大的转折时期。自由民权运动在明治政权的镇压和分化下，宣告失败。甲午战争以日本得胜告终，政治经济相对安定，资本主义开始繁荣。文学方面，以小说和评论为中心，开始了文学改良运动。近代文学的关键问题——写实主义，已提到日程上来。这一时期，可谓是从不彻底的写实主义向真正的现实主义过渡的阶段。

1885年，日本近代第一本文学理论著作，坪内逍遙的《小说神髓》问世，提出一套系统的文学理论，主张描写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力矫封建伦理劝善惩恶那一套，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强调采用西方的写实方法。坪内逍遙还按照自己的理论，创作一部小说，名为《一读三叹当代书生气质》（1885），作品写得并不成功，停留在描摹明治时代的新风俗——几个大学生，即“书生”的生活情景，仍不脱江户时代“戏作小说”的窠臼。后来，坪内逍遙转而致力于研究和翻译莎士比亚，改良戏剧。从启蒙和改良的角度来看，坪内逍遙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887年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出版，开创了一代新文学。二叶亭晓通俄语，对俄国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最初试译过俄国小说，后来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坪内逍遙小说理论的影响下，用言文一致的新文体创作了《浮云》，塑造了在明治政权的专制统治下，一个个性受到压抑的近代知识分子形象。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主人公文三的内部苦闷。文三想要正直地生活，却四处碰壁，不为社会所容，也不为亲人理解，在环境和时代的重压下，他感到愤懑又无力反抗，甚至在爱情上也那么优柔寡断，徬徨不定。在这个人物身上，不难看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影子。这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第一个获致自我觉醒、追求自由的典型形象，也是在小说里批判现实社会的第一部作

品,所以《浮云》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虽然颁布了《帝国宪法》,召开了“帝国议会”,但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人民并未得到自由民主,时代气氛沉闷逼仄,一般人还有待于从旧的封建意识中解脱出来。象《浮云》这样的新文学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还不能生根,小说中所提出的问题,如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官僚制度的卑劣,新旧思想的对立,主人公那种时代的苦闷,一般人尚不能理解,作家本人对自己的创作能否在日本的土壤上得到发展,也失掉信心。小说未完,二叶亭便长期搁笔,中止写作。批判现实主义在日本才露端倪,终究未能得到发展,形成一股文艺思潮。倒是以尾崎红叶(1867—1903)为代表的“砚友社”作家,和不属于该社的幸田露伴等人的文学,风靡文坛。他们接受坪内逍遙倡导的写实主义理论,但理解较肤浅,对于社会和人生缺乏深刻的观察和理解,不能把握时代的本质,更没有《浮云》那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往往流于风俗描写,尤其带有明显的江户文学痕迹。由于他们的作品多以书生和女学生为主角,大抵写些才子佳人式的言情故事,颇受市民阶层欢迎,所以这派作家竟能独霸文坛达二十年之久。

浪漫派文学在日本为时很短,而且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方面。代表作家是以《舞姬》这篇自传式小说登上文坛的森鸥外(1862—1922),和以北村透谷(1868—1894)为中心的《文学界》同人。他们更注重人的精神世界,探索近代文学的本质。森鸥外的《舞姬》描写了自我的觉醒与挫折;《文学界》的诗人则受基督教及拜伦等欧美浪漫主义、个人主义思潮的启发,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尤以北村透谷最为彻底。他的《楚囚之歌》、《蓬莱曲》等诗作,表现了对现实的批判与理想的追求。他把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不可能实现

的民主自由,企图到精神领域中去寻求,从而提倡“内部生命论”,主张破坏一切旧传统旧观念,强调个性解放。相比之下,北村透谷更接近于西方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而森鸥外的作品,则缺少欧洲浪漫派那种热烈奔放的激情和勇于反抗的叛逆精神。但,北村透谷最终也为现实所迫,不得不逃避到“冥想的世界”中去,“他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始终伴随着深重的悲观主义”^①,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带着浓重的唯心色彩,终于对现实感到幻灭,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文学界》在失去北村透谷以后,革命的批判精神渐趋淡薄,逐渐走上艺术至上的道路。

1892年,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象彗星一般出现在文坛上,在短暂的四年创作生涯中,相继发表《埋没》(1892)、《大年夜》(1894)、《青梅竹马》(1895)、《岔路》(1896)等优秀短篇小说。她虽受《文学界》浪漫主义的影响,却更倾向于现实主义。以抒情幽婉的笔致,暴露黑暗的社会现实,描写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的悲欢。

国木田独步(1871—1908)也是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兼作家。他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由浪漫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他受到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影响,热爱大自然。从他最早的诗集《独步吟》(1897)到散文诗《武藏野》(1904),以浪漫的抒情手法,表达对现实失望之余,寄情山木景色的心声。他的《源大叔》(1897)、《少年的悲哀》(1903)、《青鸟》(1904)等作品,虽然也不乏浪漫的诗情,更多的是对命运的探索,对人生的留恋。随着他对现实的深入观察,对人间命运的哀伤思索,对下层百姓的深切同情,在后期作品如《穷死》(1907)、《竹栅栏》(1908)、《两个老人》(1908)里,透过表面那层感伤的薄纱,可以看出他现实主义精神的增长。

^① 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53页。

国木田独步的小说，短小而有韵致，充满诗情画意，十分优美。吉田精一曾正确地指出：

“日本的短篇小说是由他开创的。”^①

继《文学界》一派的初期浪漫主义运动之后，由与谢野铁干（1873—1935）组织新诗社，创刊《明星》（1899），以短歌为主，迎来了浪漫派诗歌的全盛时期。主要诗人有铁干的妻子晶子、吉井勇、高村光太郎、北原白秋等人。他们在短歌里抒发青春的激情，讴歌爱情，肯定官能，题材较为狭窄，已失去《文学界》那种追求自由、谋求解放、否定现实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正冈子规（1867—1902）从事俳句革新之后，进而对短歌进行革新，主张“自由写实”、“客观写生”，力图建立清新明快的近代诗歌风格，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同富于空想的“明星派”相反，这派诗人的短歌，更具客观现实性。稍后，伊藤佐千夫（1864—1913）和长塚节（1879—1915）发展了正冈子规的理论，诗歌也更具乡土气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近代工业的发达，促使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劳资问题突出起来，如足尾铜矿事件、纺织女工的悲惨境况等。而明治政府又在准备新的战争——日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渐趋尖锐。作家们企图打破硯友社狭隘的言情小说框子，开始关注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予以表现。川上眉山（1869—1908）的《书记官》（1895）揭露官商勾结，为非作歹；广津柳浪（1861—1928）的《黑蜥蜴》，反映东京贫民窟的悲惨生活；泉镜花（1873—1939）批判世俗道德观念，创作了《巡夜警察》（1895）、《外科室》（1895）等。这类小说，与其说是客观地反映现实，不如说是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理念思考，为了写悲惨而写悲惨，因此一般称为“悲惨小说”或“观念小说”。他们大抵属于硯友社

系统，创作上较尾崎红叶等人的才子佳人式小说有所发展，开始接触黑暗的现实和社会问题，但却不知其产生的根源，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悲惨小说”和“观念小说”，流行未几，便衰落下来。川上眉山自杀身亡，泉镜花则转向怪诞、神秘、超现实的浪漫主义，写出《高野圣》等著名小说。

其后，出现德富芦花（1868—1927）揭露政治黑暗的《黑潮》等一系列政治小说，以及木下尚江（1869—1937）的反战作品《火柱》（1904）、《良人的告白》（1904）等等。尾崎红叶那本以爱情与金钱为主题、广泛反映明治时代生活的《金色夜叉》（1897），在某种意义上也可列入社会小说之内。这类社会小说，尽管着眼于社会问题，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在艺术上都不能够成熟，流于通俗文艺一路，不久便为自然主义文学所取代。

日俄战争后的几年里，在西方自然主义思潮的触发下，自然主义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在日本蓬勃发展，在文学观念上发生深刻变化，影响之深广和久远为前所未有。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至此形成一个高峰。

在自然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两大巨匠，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站在反自然主义的立场，进行光辉的文学活动。此后，这种反自然主义或者说理想主义的文学思潮，得以逐渐发展扩大，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对自然主义进行批判。属于这股文学思潮的，既有唯美主义作家，也有在大正年间（1911—1925）出现的白桦派和新思潮派。但不管怎样，这种反自然主义文学终究是在继承自然主义文学所奠定的近代写实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白桦派和新思潮派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学，其共同特点是受到理想主义的影响，重视探索自我

① 《现代日本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8页。

的内心世界。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近代少有的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日本资本主义繁荣异常，民主思潮空前高涨；稍后，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影响，阶级意识增强起来。于是新一代新人崛起，新的文学运动也随之兴起。无产阶级文学登上文坛。资本主义的繁荣固然带来物质文明，但也酿成人性的瓦解和精神的危机。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日本最早的现代派——新感觉派文学应运而生。这样，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现代派文学既同时出现，相互对峙，又共同在否定旧文学：一个要求内容上的革命，一个要求技巧上的革新。于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由白桦派和新思潮派所代表的近代文学的基础。近代文学虽抵达鼎盛时期，却同时开始了它的解体，不得不让位于现代文学。

第二节 自然主义及其代表作家

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即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但是，尽管坪内逍遙早在《小说神髓》中即已从理论上提出并阐述写实的问题，同时又有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为其开路，以及后来的浪漫主义诗歌运动、悲惨小说、观念小说、社会小说等一步步发展了写实主义，然而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日本却始终未能形成一股文艺思潮。这是因为日本近代文学产生之日，正值自然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之时；此外，也由日本特殊的国情所决定。当时一些作家和理论家，为了发展日本新文学，向欧洲文坛寻找最新的创作借鉴和理论根据。于是，左拉的自然主义文艺理论，就作为“最新”的文艺思潮传入日本，并在本世纪初，席卷文坛，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学的发展。

1900年，小杉天外（1865—1952）从左拉的《娜娜》受到启发，写了《初姿》，翌年又出版了《流行曲》；小栗风叶（1875—1926）也于1901年发表《觉醒的女人》和《泥沼中的

女人》；1902年永井荷风发表《地狱之花》，这些都是日本自然主义早期的代表作。他们模仿左拉，主张以客观的态度，做冷静的观察，如实的反映，一味在作品中暴露人的动物本能，只求事物表面的逼真，不做典型化的概括。小杉天外在《流行歌》的序里写道：“自然即是自然，非善非恶，非美非丑……小说乃想象中之自然，实无可叙与不可叙之羁绊……读者感动与否与诗人无关。诗人唯有如实描写其想象中之事物而已……其间不容夹杂丝毫之‘我’。”而永井荷风在《地狱之花》的跋中更进一步强调说，“人类确实难免有兽性的一面……如要塑造完美理想之人生，我深信非对此阴暗面先特加研究不可……为此，我将毫无忌憚地致力于描写由祖先遗传和环境熏染的蒙昧的情欲、武力、暴行等等事实。”显然，他们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得之于左拉，却又只片面强调左拉理论中颇遭非议的部分，根本忽略了左拉要描写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史”那种恢宏阔大的气魄和现实主义精神。小杉天外摒弃作家对现实的善恶美丑的判断，排斥作家对现实的主观态度，单纯追求纯客观的描写，永井荷风则把题材局限于揭露人性恶的一面，耽于描写人的情欲。尽管《流行歌》从遗传角度叙述女主人公与人通奸的故事，其中也不乏环境描写，《地狱之花》意在揭露教育家以伪善的面貌强奸少女的丑行。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小说情节结构的一部分。且不谈左拉从遗传学和生物学角度来分析人的理论正确与否，至少他的意图在于借此说明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他不但“研究一个家族中的血统和环境问题”，而且还要“用事实和感觉描写出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并且在各种风俗和事件的细微末节中刻画出这个时代”^①。其结果，“无疑是病理研究让位给了社会研究，生物学的决定论让位给了社会环境的决定论，‘家族史’让位给了‘社会史’，现实主义

终于取得了对自然主义的优势。”^②

然而，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不论是早期作家，抑或是鼎盛时期作家，如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等，都远不能与左拉相比。他们的创作，很少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或重大的现实题材。这是日本自然主义不同于西方自然主义的最大特点。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当时日本社会的半封建性，严重束缚了人的个性，宗法式的家长制限制了人的自由。作家在如实描写现实的时候，首先遇到的课题，便是个人与家族制度的对立，其实也是同整个社会的对立。他们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攫取家庭这一最为现实的题材。所以，自然主义小说中，以家庭问题为主题的作品，着实不少。而且，出诸冷静的观察，客观的态度，“逼真”的描写，把一己的生活经验，看作最为真实，把题材局限于身边琐事的铺叙，将个人生活与家庭问题同整个社会割裂开来，当然也就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批判力量，更谈不上“如实”反映时代的本质，所以，自然主义在创作上带来的副作用之一，就是造成后来描写身边琐事和个人心境的“私小说”的泛滥。由于作家耽于自我暴露，只看到人的丑恶一面，认为是无可逃避的宿命，对人生深感幻灭，产生“暴露现实的悲哀”，使作品笼罩着悲观绝望的色彩，阴暗低沉的基调。当然，对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须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日本的评论界常把自然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混为一谈，所以，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中，实不乏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和《一个士兵》，正宗白鸟的《牛棚的臭气》等；也有颇多小说，虽具自然主义倾向，却在客观上起到揭露现实、批判社会的作用，如岛崎藤村的《春》、《家》，田山花袋的《生》、《妻》等。

日俄战争后的六七年间，是自然主义的

全盛时期。在这一阶段，作家辈出，成果丰硕。代表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正宗白鸟等人。而影响最大，奠定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基础的，则是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

岛崎藤村（1872—1943），最初以浪漫派诗人崭露头角。在明治学院就读英文时，受基督教洗礼。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熏陶下，培养出尊重个性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毕业后在母校执教。《文学界》创刊时，亦为编辑同人，发表诗文。1896年后，在仙台东北学院任教，发表一系列浪漫派抒情诗歌。1897年，他的第一部著名诗集《嫩叶集》问世，陆续又出版《一叶舟》、《夏草》（1898）、《落梅集》（1901）等诗集。在这些诗歌里，他以清新明丽的语言，讴歌爱情，礼赞青春，抒发其对艺术和自然的憧憬，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人生，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劳动和生活的思索。对日本近代诗歌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1899年，岛崎去小诸、信州任教，至1905年举家迁回东京。小诸的六年，岛崎藤村由浪漫的抒情转向正视现实，由诗歌创作渐向小说过渡。这一时期，生活虽然清贫，但远离都市的尘嚣，僻居在尚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地域，得以亲近和观察自然，潜心于小说创作，写出《旧东家》、《草鞋》（1902）、《水彩画家》（1904）等短篇小说。作品涉及情欲、乱伦等内容，手法上仿佛是自然的写生，颇具乡土气息，是他小说创作的练笔阶段。

1906年，岛崎藤村自费出版他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长篇名著《破戒》。小说叙述一个隐瞒贱民出身的小学教师丑松，经过种种思想苦闷和内心冲突，终于自我觉醒，敢

①② 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二《左拉》条，第1258、1259页。

于反抗社会的歧视，打破父亲临终时给他立下的戒律，坦露自己的出身，最后离日赴美，寻求新的生活。小说提出一个当时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部落民问题，写出他们所受的压迫，对这野蛮的封建身分制予以尖锐的批判，对被压迫者表示深切的同情，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作者不仅塑造了丑松这一典型人物形象，还再现了当时闭塞落后的社会生活和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出色地描写了信州、小诸一带的自然风光。作品完全突破了自然主义的手法，虽然结尾稍嫌软弱，有些妥协意味，但总的说来仍具较高的思想意义，是日本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可是，日本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篇自然主义的奠基作。因而，摆在岛崎藤村面前有这样两条创作道路：一是继续走《破戒》所开创的道路，深刻反映社会现实；一是以个人生活为中心，走私小说的道路。当时适逢田山花袋的《棉被》（1907）问世，在其影响下，岛崎藤村选择了后一条路，发表了《春》（1908）、《家》（1910）、《新生》（1918）等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

《春》是作者最初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以北村透谷为首的《文学界》同人在时代的压抑下郁郁不舒的心情。书中以浪漫的感伤气氛，烘托作者青年时期的苦闷与追求。《家》以岛村自己的老家和姐姐的婆家为蓝本，描写两个旧家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没落的景况，表现呻吟于封建家族制度下个人的痛苦与不幸。小说虽然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当时的家族制度，但缺乏批判精神。作者只是以一双忧郁的眼睛，取静观的态度，作品明显带有自然主义倾向。《新生》是岛崎藤村为了逃避同侄女的恋爱关系赴法归国后创作的。那时，明治时代已经结束，自然主义运动也已衰落。小说叙述了作者同侄女的爱情纠葛，但是更加侧重于心境的倾诉。岛崎藤村晚年的作品有《樱桃熟了的时候》（1924）、《黎

明之前》（1936）和历史小说《东方之门》（遗作，1943）等。这些作品基本上保留了自然主义的特点。

田山花袋（1871—1930）出自砚友社尾崎红叶门下，由于出身贫寒，早期作品多以人生的孤苦或对女性的追求为主题，作风感伤沉郁。后来向《文学界》投稿，并同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等人接近，发挥其诗人气质，写下不少浪漫情调的诗作。因广泛涉猎外国文学，颇受莫泊桑、福楼拜等法国作家影响。此后逐渐摆脱多愁善感的诗人情怀，作风渐露自然主义的写实倾向。1902年，发表短篇小说《重右卫门之死》，作品根据一段实事，写一个精神与肉体均有缺陷的男子重右卫门放火烧村，被村民溺死的事。小说并不十分成功。1904年，发表《露骨的描写》一文，主张作品可以“暴露隐私”，引起文坛的重视。这一年，他作为随军摄影记者，前往日俄战场，冷眼观察战争厮杀和人性在战场上的暴露，写成《从军日记》（1905）一书。日俄战争结束后，国木田独步发表《独步集》、《命运》获得好评，岛崎藤村的《破戒》更为轰动，田山花袋不免焦躁起来，于是决心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创作中篇小说《棉被》。

《棉被》的故事是，一个中年作家偷偷爱上了自己的女弟子，为情欲与道德的冲突深自苦闷；女弟子与别人恋爱，他出于嫉妒，想方设法从中破坏，迫使女弟子返回故乡。作品的结尾，写他拥着女弟子盖过的棉被，嗅着被上的余香，不由得流下失望与悔恨的泪水。小说通篇写的都是作家一己的生活琐事，表现的是那种压抑着的性的苦闷，结尾部分的暗示尤其露骨。作品不仅缺乏深刻的思想，也不具任何社会意义。后来专写个人生活、进行自我暴露的“私小说”亦滥觞于此，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实有消极的影响。但是，作品于1907年发表后，即引起极

大反响，文坛给予高度评价。当时自然主义的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推崇说，这是一部“活生生的人，赤裸裸的人的大胆的忏悔录……毫无遗憾地代表了倾向于描写丑恶的自然派的一面……是人的难以遏止的野性的呼声。作者使其同理性的一面相对照，向公众呈现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性格的标本，令人简直不能正视。这恰是这部作品的生命与价值。”于是，《棉被》与《破戒》在日本被视为自然主义的两大经典小说，田山花袋与岛崎藤村成为齐名并列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家。

《棉被》以后，田山花袋陆续发表一些较为重要的长短篇，如《生》、《妻》、《乡村教师》、《一个士兵》（以上均发表于1908年）、《缘》（1910）、《恒世万年历》（1914）等。《生》、《妻》、《缘》等三部作品，仍以“私小说”手法，描写个人家庭生活；《乡村教师》、《一个士兵》、《恒世万年历》则不同于一般的“私小说”。《乡村教师》叙述一个怀有理想的青年，为贫困所迫，在乡下做小学教员，志不得伸，郁郁成疾，终于在日俄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寂寞地死去，塑造了一个受社会压制的青年形象。《一个士兵》和《恒世万年历》都是短篇，前者写一个士兵在日俄战争时远离故国，抛别妻小，病死异国的惨状；后者写一个被怀疑是社会主义者的青年，处处受官宪监视与压迫的悲惨生活。这三篇小说，作者尽管采用客观主义的态度，但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批判精神。尤其《乡村教师》以纯朴的乡村为背景，笔调感伤抒情，感情真挚动人，不失为一篇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第三节 夏目漱石与森鸥外

正当自然主义风行一时的年代，夏目漱石和森鸥外这两大家，各自以独特的风姿，卓然自立，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夏目漱石（1867—1916），是位杰出的

现实主义作家。原名夏目金之助，生于东京一没落的小官吏之家。早年学习汉籍、唐宋诗文，后来改学英文。189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嗣后，先后到东京高等师范、爱媛县松山中学、熊本五高教授英文。1900年被派往伦敦留学，研究英国文学。他在地方教书的四五年间，接触到一些社会现实，深感日本社会的鄙陋，教育的腐败；三年的留学生活，一方面使他认识到日本与西欧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也看到金钱万能的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使他极为反感，深为失望。然而，“回国后的三年半也是不愉快的”，常为神经衰弱所苦，家庭生活也不圆满，他很想辞去教职。为摆脱这种困境，以求解脱，便开始写作小说。1905年，他的成名作《我是猫》问世。小说以猫的一双眼睛，观察主人苦沙弥一家及其周围人物的种种行状，批判明治社会的黑暗腐败，辛辣地讽刺了利欲熏心的资本家和金钱万能的世态。对于苦沙弥等一群自命清高、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只会高谈阔论，缺乏行动的软弱，以及他们的虚伪，也加以挖苦嘲弄。小说“轻快洒脱，富于机智”，通篇充满幽默的讽刺，一泄作者郁闷心头的多年愤懑。作品的成功，为夏目漱石赢得极大的作家声誉。翌年，出版《哥儿》、《旅宿》以及短篇《伦敦塔》等。《哥儿》取材于作者在松山中学任教时的一段经历，写一个生性耿直，不懂人情世故，不会逢迎拍马的青年教师，出于正义感，反抗卑鄙龌龊的现实，揭露教育界内的黑暗腐败；《旅宿》则描绘一个青年画家，为逃避尘世的庸俗烦扰，而去寻求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这两部小说，虽然写于同期，风格迥然不同。前者承接《我是猫》的幽默讽刺笔调，发扬了夏目漱石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后者则充满浪漫的幻想与优美的诗情，表现出作者超然物外、消极避世的美学观点。两篇作品都获得好评，

《哥儿》的成就尤在《我是猫》之上，至今仍为青年学生所喜爱。

1907年，夏目漱石辞去所有教职，接受《朝日新闻》的聘请，任文艺栏主编，并在该报先后连载《虞美人草》（1907）、《矿工》（1908）、《三四郎》（1908）、《后来的事》（1909）、《门》（1910）等作品。其中《三四郎》、《后来的事》和《门》，可视为三部曲，是夏目漱石中期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虽非同一人，但主题有内在联系，故事前后衔接。《三四郎》描写一个叫三四郎的青年到东京上大学的生活及其成长过程；《后来的事》叙述主人公代助大学毕业后，同已成为朋友之妻的昔日情人重逢，刻画他旧情重燃的复杂心理和对社会的反抗；《门》描绘一对中年夫妻阴暗不安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苦闷。三部曲通过爱情与道德的冲突，揭示人物的心理，展开对社会的批判，塑造了既对现实不满、又无力抗争的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夏目漱石从初期创作《我是猫》开始，到中期的《后来的事》为止，始终坚持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但是，到了晚年，一方面由于重病缠身，一方面由于高压的政治气候，便转向描写知识分子的孤独苦闷，剖析人的利己主义。文风也由前期的“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演变而为后期的沉潜凝重。其代表作品，有《心》（1914）、《路边草》（1915）、《明暗》（1916）等。《心》的主题，依然是爱情与道德的冲突，叙述主人公虽然恋爱成功，建立美满家庭，却因此使好友自杀身死，使他深感矛盾，痛苦不堪，终于以死相酬。小说的心理刻画十分细腻，主人公那种沉重的精神负累，无法解脱的内心苦闷，正是当年知识分子的极好写照。《明暗》是夏目漱石最后一部小说，未及写完，便与世长辞。

夏目漱石对东西方文学艺术均有很高造诣，既有西方的民主思想，又兼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老庄的出尘思想，同时又深受日

本古典俳句传统的影响。这些融合在一起，形成夏目漱石的思想基础和创作风格。他的小说，形式不拘一格，语言简练，富于表现力。一生创作了十五六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还有些散文、随笔。他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卓越贡献，具有深远影响。

森鸥外（1862—1922），最早是作为浪漫派作家名重一时的，后来转向历史小说创作。他生于下级武士家庭。少年时学习汉籍古典，后来入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于1881年，就职于陆军部。1884年，为研究卫生学，奉命赴德进修。四年的留学生活对他影响甚大。除在医学上得到深造外，还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名著，研究叔本华哲学，接受哈特曼美学观点。回国后，历任军医教官、陆军军医总监以及陆军部医务局长等职，同时创办《栅草纸》一刊，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从事文学评论，开展启蒙活动，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根据自己留德期间的经历，敷衍成一篇小说，这就是日本早期浪漫主义的开山之作《舞姬》。小说描写一个青年官员留学德国，同当地一个贫穷的舞女相爱，但在明治封建官僚制度的压制下，他们的爱情终于酿成悲剧。作品充满浪漫的抒情气息，表现主人公觉醒之后，屈从于现实的重压所产生的悲哀，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属于同类题材的作品，还有《泡沫记》（1890）、《信使》（1891）。

1909年以后，森鸥外发表一系列现代题材的作品《半日》（1909）、《青年》（1910）、《妄想》和《雁》（1911）等。《青年》的创作动机，据说受夏目漱石的《三四郎》的触发。描写一个地方出身的青年，在东京求学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过程。森鸥外把主人公塑造造成一个理想的青年典型，通过这个形象展开对日本社会的批判。《雁》叙述一个贫苦少女沦为高利贷者的妾的不幸命运。她偷偷爱

上一个天天从家门口经过的大学生，本想向大学生表白真情，追求幸福，却受到命运的播弄，出了个偶然，失去了机会。小说的主题，表达了“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哀”，想必也是森鸥外本人心境的一种流露。小说结构匀整，心理刻画细腻，哀婉惆怅，写得相当精采。

1910年以后，由于时代的闭塞和政治气候的高压，森鸥外转向历史小说创作。表面看，他好似对现实表示冷漠，无动于衷，实际上，写历史小说，乃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首先根据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乃木希典殉死的事件，写成《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1912），探索武士的精神生活。他在这篇小说里先是肯定武士的殉死行为，但第二年创作的《阿部一族》，则又揭露这种封建武士道德的残忍，批判其虚伪及不人道。这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上的两重性。作为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洗礼的作家，他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作为明治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又有其维护现存制度的保守一面。再者，武士家庭灌输给他的封建伦理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从早期发出反抗呼声的《舞姬》，走向与现实妥协的结局。森鸥外的历史小说，是本着“遵照历史与脱离历史”的原则创作的，但基本上尊重历史事实。除上面提到的两篇外，还有不少优秀的历史小说，如反映日本古代社会生活的《山椒大夫》（1915），揭露封建统治的残酷，反对封建压迫的《最后的一句话》（1915），描写江户时代城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高瀬舟》（1916），以及传记文学《涩江抽斋》（1916）等。

第四节 白桦派与新思潮派

差不多与唯美主义同时，有一代新作家崛起，这便是白桦派。他们反对自然主义专事暴露卑微丑恶的人生，也不同意耽于享乐的唯美主义，主张肯定人生，尊重自我，发

展个性，作品中洋溢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这在当时气压颇为低沉的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志贺直哉（1883—1971）、有岛武郎（1878—1923）等是这派的代表作家。他们都是上流贵族资产阶级子弟，学习院出身。1910年出于共同的理想和主张，创办同人刊物《白桦》，“白桦派”的称呼即由此得名。但他们的创作倾向却不尽相同，有的站在现实主义立场，揭露社会，批判现实，如有岛武郎，有的则偏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如武者小路实笃，有的则显示其人道主义精神，如志贺直哉。

白桦派的成果之一，是给日本近代文学带来了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产生许多优秀的作品。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白桦》停刊，这一派遂宣告解散。

武者小路实笃早期受托尔斯泰影响。他在《好好先生》（1910）、《不见世面的人》（1912）、《幸福者》、《友情》（1919）、《生死恋》（1939）等作品中，或者追求理想的爱情与友谊，或者塑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具有反战思想的剧作《他的妹妹》（1915）和《一个青年的梦》（1916）。与此同时，发起“新村”运动，创建乌托邦式的“新村”。总的说来，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不事雕琢，不大讲究章法技巧，淳朴率直，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剖析自己，具有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志贺直哉擅写短篇小说。他的处女作《到网走去》（1910），即能显示他圆熟的技巧和创作风格。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剃刀》（1910）、《正义派》（1912）、《清兵卫和葫芦》（1912）、《范某的犯罪》（1913）等，都写得相当精致。中篇小说《和解》（1917），写他与父亲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及和解过程，表现他发展个性，反抗习俗与道德的态度。《暗夜行路》（1921—1937），是

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描写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幸生活和思想苦闷。上述两部中长篇，及同一时期写的《在城崎》（1917）、《佐佐木的遭遇》（1917）等，都表现出作者那种沉潜、淡泊的心境，趋于调合，缺乏前期的反抗精神。就题材而论，志贺直哉以写个人心境和身边琐事为主，题材范围狭窄，很少有描写社会题材的作品。尽管如此，仍可感到作家的正义感和洁身自好的品格。

有岛武郎是位“有良心的人道主义者”，早年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后来对宗教发生怀疑，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十月革命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虽然认识到“无产阶级是有希望的”，“资产阶级没有希望”，但他终于不能超越阶级的局限。1922年发表轰动一时的《一篇宣言》，表达一个觉醒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思想上的变化。嗣后，把自己在北海道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1923年，与女记者波多野秋子情死。

有岛武郎的创作，与志贺直哉恰好相反，多着眼于社会问题。主要作品有《该隐的后裔》（1917）、《不惜夺爱》（1917）、《与幼小者》（1918）、《一个女人》（1919）等。《该隐的后裔》以广漠苦寒的北海道大平原为背景，用油画般的强烈色彩，雄浑刚劲的笔触，塑造一个性格粗犷的农民，在农场主的压榨下，不甘贫穷，不向现实妥协，单枪匹马，反抗一切，但等待他的，依然是失败的悲惨结局。小说揭露了农场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较早地提出了农民问题。《一个女人》被认为是“日本真正具有小说结构的近代长篇小说”，刻画一个受过资产阶级教育、自我觉醒的新女性，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但在社会习惯势力的压迫下，终于悲愤地死去。作者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社会问题，写得深刻有力，人物形象鲜明。这两部作品，堪称日本批判

现实主义的杰作。

继白桦派而起的，是新思潮派，又叫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一般是指第三次（1914）和第四次（1916）复刊的《新思潮》一刊的同人。代表作家有芥川龙之介（1892—1927）、菊池宽（1888—1948）、久米正雄（1891—1952）、山本有三（1887—1974）等。他们既反对自然主义那种平铺直叙、沉闷琐碎、冗长散漫的纯客观写法，也对白桦派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表示怀疑。他们主张理智而冷静地探讨人生，揭露社会黑暗，鞭挞人世的虚伪。在艺术上讲究技巧，重视鲜明的形象和生动的语言，擅长心理刻画。

芥川龙之介是这一派的主将。他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历史题材，尤以早期和中期为多。他用托古喻今的手法，深刻地揭露现实的丑恶，表述他对人生和艺术的各种见解。《罗生门》（1915）、《鼻子》（1916）、《地狱图》（1918）、《竹林里》（1922）是这一类的代表作，也最能显示芥川龙之介的特点：典雅的语言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巧妙的布局和含蓄的命题，以及机智幽默的情趣。他的现代作品，题材较广，有描写劳动人民纯朴、真挚感情的《桔子》（1919），描写现代男女青年苦闷的《秋》（1920），表现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块土》，以及对法西斯监狱的非人道待遇表示愤慨的《寒冷》（1924）等。后期创作基本上从历史转向现代，风格上亦有变化。《玄鹤山房》、《河童》、《齿轮》、《傻瓜的一生》（以上均作于1927年，后两篇生前未发表）等作品，表现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探讨现实人生时经过幻灭后的悲观绝望。总之，不论其历史小说还是现代小说，正如鲁迅所说，创作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正不安时的心情”。

芥川龙之介才情纵横，具有浪漫气质，

但对现实的态度是严肃的。他深入现实，探讨人生，结果“看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罪恶”，也曾不断地追求理想，得到的却是幻灭的悲哀。他虽然看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但又认为“在自己的灵魂上打着阶级的烙印”，他“不能超越时代”，也缺少“拥抱新时代的热情”，于是极感矛盾，深为痛苦，觉得“人生比地狱还地狱”，终于在对未来的“恍惚不安”中，于1927年7月24日，

服安眠药自杀。

芥川之死，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日本引起很大震动，文坛上更是惋惜，认为他代表了“日本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一面”，他的死“是时代的牺牲品”。为纪念芥川在文学上的业绩，文艺春秋社从1935年起设立以他名字命名的“芥川文学奖”，至今仍是奖励青年作家的最高文学奖。

第二章 近代朝鲜文学

周有光

第一节 概述

近代朝鲜文学包括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即“启蒙文学”和1910年至1919年的文学。

一、“启蒙文学”

“启蒙文学”在近代朝鲜文学中占有中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包含有“新小说”、“翻译政治小说”、“英雄传记”和诗歌等多种体裁，在形式上为中古朝鲜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起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并且以它独特的主题和社会作用，在朝鲜文学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

“启蒙文学”的得名，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朝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资本主义的输入，逐步由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发展，至1910年终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朝鲜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起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继1883年和1884年暴动之后，1894年又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甲午农民战争。此后，义兵斗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给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进行，在文化领域内开展了爱国文化启蒙运动。这种文化启蒙运动包括教育运动、出版文化活动和国文运动等多种形式，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传播文明知识，提倡独立自主的新思想，以达到唤醒民众，奋起救国。

“启蒙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下面按体裁分类加以论述。

1. “新小说”

“新小说”又称启蒙期小说，它有别于以前时期的旧小说。这种区别表现在其一，

“新小说”的作者都具有新时代的思想，他们之中绝大部分的人在主观上都希望通过反封建、鼓吹文明开化，以求得国家的自主独立。其二，“新小说”虽然多取材于封建家族的生活，但是，作品中贯穿着新与旧的对立，对新思想的歌颂和对旧事物的摒弃。其三，以前的小说大部分立足于历史题材，或以外国现实生活为时代背景，但“新小说”多以本国的现实生活为题材，背景也是基于本国的现实生活。“新小说”虽然和以前的小说有很多区别，但两者之间又有不可分的联系，这就是“新小说”继承了以前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发展。“新小说”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较以

前的小说有进一步的提高,这些思想艺术上的成就为以后朝鲜无产阶级作家直接继承下来。特别在形式上,“新小说”一般都用国语(朝鲜语)书写,这就为朝鲜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直接创造了条件。然而,“新小说”也有局限性,这就是“新小说”在主题思想上反封建是不彻底的。这是因为文化启蒙运动的担当者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是,正和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在经济上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一面。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因而在1910年,随着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爱国启蒙运动便丧失了原有的进步意义,“新小说”在这时也接近了尾声。

“新小说”的主要作品有李人植的《雉岳山》、《鬼之声》,李海朝的《自由钟》,具然学的《雪中梅》和金教济的《显微镜》等。李人植的《雉岳山》和《鬼之声》主要是通过封建家族的内部矛盾,反映新旧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李海朝的《自由钟》写于1910年,他和李人植是“新小说”的代表作家,在文化启蒙运动中,和李人植一样起过积极作用。

代表作《自由钟》在结构上是新颖独特的,它是以所谓“讨论小说”的形式创作的。作品没有完整的事件和情节,只是一群受新文化思潮影响的妇女,在参加某妇女寿宴上展开的谈话,以讨论的形式来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妇女的权利、提倡国语、废除身分差别和改革教育中的弊病等方面。但是,无论是哪一类的问题,其中都贯穿着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例如,讨论重视自己国家的语言时,一位叫金云的妇女说:“我国的汉文只是表达中国的精神,何益于我国人民?”她的这一番言论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只注重汉文,却无视朝鲜文字的不良风气而发的。她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明白事理,

然而,如果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即使把《诸葛亮传》和《俾斯麦传》读上千万遍,也难于使我国免受目前这种悲惨的处境。”

另一个叫雪轩的妇女发言强调先驱者在促进朝鲜社会向正确道路发展的重要性,她说:“别看我们几个妇女瞎哼哼,只要有人敢于倡导,没有不能成功的事。”

在谈到消除身分差别的问题时,一位名叫梅庆的妇女说:“即使是奴婢的子女,乞丐的儿孙,也不应受到歧视,因为他们都是我国的普通公民。”她的这种见解也是针对当时用人的不当,不以真才实学取人,只注重身分差别的社会弊病而发的。

这篇小说的局限性在于虽然对封建制度有所批判和揭露,但没有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只是期望某种程度的改良。

李海朝除《自由钟》外,还创作了《鬓上雪》、《驱魔剑》、《牡丹瓶》和《李舜臣实记》等作品。《鬓上雪》揭露封建蓄妾制度的矛盾,《驱魔剑》是以破除封建迷信为主题的作品。

具然学的《雪中梅》通过泰顺等人物形象,提出改革政治的思想。小说是以章回体形式创作的,作者在小说第三回中,着意描写了参加独立会馆的人所发表的演说。从这些演说的题目如《奋发》、《寄希望于同胞》、《同等权利》……,可以看出这篇小说的主旨所在。尽管政府明文禁令各地不许搞演讲会,学校不准开讨论会,但是,爱国志士们不顾个人安危,仍然集结在一起,为祖国的独立、民主和兴盛,慷慨陈言,大义凛然。

金教济的《显微镜》通过对当时官僚统治阶级的最高当权者之一法部大臣的批判,揭露了封建特权阶层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不顾法律准则,任意残害人民的罪行,反映了人民对封建暴吏的愤恨和不满。

2. “翻译政治小说”

“翻译政治小说”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产生的,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内修外学”为

标榜，掀起了爱国启蒙运动，期望朝鲜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为此，他们大量翻译介绍了外国的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或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小说，以提高人民的思想意识，唤起他们的觉醒。这些小说有《经国美谈》、《瑞西建国志》、《柯苏特传》、《爱国夫人传》、《越南亡国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彼得大帝传》和《美国独立史》等。

《瑞西建国志》是朴恩植于1907年翻译出版的，小说描写了瑞西人民为争取祖国独立、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小说的主人公威廉·退尔是个杰出的爱国者，他把全国人民团结在爱国党的周围，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赶走了日耳曼侵略者，建立了共和国政权。

这篇小说由于它的基本思想切合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朝鲜社会实际，因而在当时起过较大的作用。

《爱国夫人传》是张志然于1907年翻译出版的，小说描写在法国被英国侵略者侵占的年月，爱国圣女贞德的斗争事迹。

圣女贞德不顾父母的阻挠，抱着万死不辞的决心从军之后，以一个普通兵士的身分向民众说：“天下最下贱、最可耻的莫过于做别人的奴隶！国家一亡，你我都要受人侮辱和奴役……同胞们，是愿意做独立、自由的人民，还是做下贱、可耻的奴隶？”她的这一番满腔激情的话，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苦难的朝鲜人民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1908年由李保尚翻译出版的《柯苏特传》，是描写十九世纪初匈牙利革命家柯苏特反对奥地利专制政治斗争的传记小说。这篇作品的基本思想是反帝反封建和鼓吹为国献身精神，这对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恢复国权而斗争的朝鲜人民来说，无疑起了鼓舞推动作用。

3. “英雄传记”

“英雄传记”也是适应时代要求产生

的，这是由于外来的侵略，使得救国自主和独立成了这时期社会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愿望。作品有《李舜臣实记》、《乙支文德传》、《姜邯赞传》和《崔道统传》等。这些“英雄传记”充满了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人民的斗争。如《李舜臣实记》是以壬辰卫国战争（1592—1598）为背景，描写李舜臣将军身为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统率大军消灭倭寇的不朽功绩的传记小说。作品在刻画李舜臣将军忠于祖国、勇于杀敌的精神品质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民和以李舜臣将军为首的爱国将士们的血肉联系。小说以生动的画幅描写人民用衣物积极支援军队的情景，妇女们还唱着“江江水月来”的歌谣，为将士们助战，表现出军民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

4. 诗歌

诗歌也是作为文化启蒙运动的一翼出现的，其中以唱歌在数量上居多。作品中洋溢着奋发图强的独立自主的思想。如1907年发表于《西友》第4期上的《劝学歌》（金有泽作），歌中写道：

在为生存竞争的时代，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列强对我欺凌，
谁不义愤填膺？
二千万同胞，
我们的弟兄！
此时何时，
此日何日？

总之，这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且由于它有着比过去的诗歌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既生根于群众，又在群众中得到普及，而成为以后自由诗的先驱。

这时期的诗歌文学中除唱歌外，还有民谣和歌颂反日义兵爱国斗争的诗篇。如全罗道荣山出身的义兵将领全海山就义时的诗